

書 評

劉 文 星^{*}

尹志華

《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》

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2014 年，423 頁，ISBN 978-962-996-582-2

本書為近二十年研究清代全真道重要著作之一。除大型道教叢書和宮觀山志外，作者還運用官方檔案、地方志書、金石史料，和內部口述材料、登真籙及宗譜。此前，學界對清代全真道研究，集中關注在歷史概述、名山宮觀、區域道教、全真道人物、其他相關方面。（頁 7-14）作者以既有研究不夠全面，難以看出個別道教人物和宮觀在時代脈絡中的關鍵角色，故他希望以宏觀視野，重新審視此一課題。（頁 14）

本書緣起於作者對《王常月學案》的研究。¹他後來於 2009 年 10 月，赴香港中文大學訪學。在黎志添教授指導下，他檢視王常月公開傳戒、清初全真道復興及晚清道教十分衰微等習用觀點。作者以時間為經、地域為緯，希望能全面的、系統的研究清代全真道發展歷程。

在緒論中，作者介紹清廷與道教的關係。（頁 1-7）他以清代全真道經歷

2015 年 4 月 29 日收稿，2015 年 8 月 13 日修訂完成，2015 年 8 月 13 日通過刊登。

* 作者係朝陽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。

Liu Wenxing is a part-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Taichung.

1 尹志華，《王常月學案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11）。

四個階段：順治康熙時期，全真道隨著社會秩序重建而復興；雍正乾隆時期，全真道沈寂與發展交織；嘉慶道光時期，全真道傳戒再興、叢林復振；咸豐迄宣統時期，全真道雖受太平天國、廟產興學政策衝擊，但因朝廷眷顧，依然保持興盛。（頁 14-15）

第一章指出，清朝以滿人身分入繼大統，為爭取漢人認同，重視重建文化傳統。代表儒釋道的文廟、佛寺、道觀等，不少得到修繕或新建。全真道在地方官吏與駐軍將領支持下，如武當山復真觀、終南山樓觀臺、成都青羊宮與二仙庵、南陽玄妙觀、北京白雲觀等，也漸復舊觀。此時官府選擇道品高潔的道士任住持，道風因而得到整頓，使得上述宮觀成為一方道教重鎮。包括王常月、白玄福、李常明等高道，順應時勢，積極闡教，促使全真道在清初復興。（頁 25）

在第二章，作者以清初王常月（1522-1680）與其徒譚守誠、徒孫詹太林（1625-1712），先後開壇傳戒，影響十分深遠。但令人不解的是，在詹太林以後，全真道公開傳戒活動突告沈寂；即使教內文獻記載歷代傳戒律師，仍無法找到雍、乾時期全真道大規模傳戒證據。作為全真道祖庭的北京白雲觀，自王常月以後，到嘉慶十二年（1807）間，雖無傳戒活動跡象，但全真道仍廣泛傳揚。故作者指出，全真道在雍、乾時期，呈現沈寂與發展交織現象（頁 143），但此觀點尚待商榷，主因是作者基於宗教立場，視傳戒為全真道興衰的唯一判準，而非從社會經濟角度觀察。按理說，雍、乾時期，清朝國力臻於鼎盛，政治、社會相對穩定，有利於各宗教發展。故其「沈寂與發展交織」之見，仍待深入考察。

在第三章，作者以嘉、道時期，各地道士至北京白雲觀受戒者眾多，白雲觀重新成為全真道發展先導。此際，不少地方道觀也很蓬勃，如東北盛京太清宮舉辦傳戒，千山道觀遍布。在西北，如劉合倫、朱教先、李復心、劉一明（1734-1821）等高道，或重振道風、開壇傳戒，或修建道觀、著述等身。在西南，成都二仙庵由子孫廟改為十方叢林，成為區域道教重鎮。在東南，楊來基、閔一得（1758-1836）復興全真道。在華南，李明徹（1751-1832）受官方敬重，在廣州漱珠崗創建純陽觀。（頁 205）

第四章涉及晚清全真道發展態勢。咸、同年間，太平天國與清末廟產興學，衝擊道教甚鉅，幸官府士紳護持，全真道始終保持相對興盛。最值得注

意的爲南陽玄妙觀，因方丈張宗璿（1812-1887）在捻軍、太平軍進攻南陽時，協助清軍守城，事後獲清廷眷顧。全真道龍頭北京白雲觀際此機遇，邀張宗璿來京開壇傳戒。故太監劉增祿拜張宗璿爲師並受戒，與高仁峒（1841-1907）成爲「戒友」。在劉增祿引薦下，高仁峒亦受宮廷眷顧，使白雲觀持續興盛。清末，北京白雲觀傳戒頻繁，既育成一大批弘道人才，又強化全真道宮觀間的聯繫，增強全真道內部的凝聚力。當時，不少宮觀想成爲具有傳戒資格的十方叢林。盛京太清宮、西安八仙庵邀請張宗璿前往傳戒，後這兩座宮觀監院晉升方丈，也分別傳戒。又如杭州玉皇山蔣永林、漢中留侯廟任永眞（1798-1879）、成都二仙庵宋慧安，也紛赴北京白雲觀受戒，再返地方開壇傳戒。此外，湖州金蓋山純陽宮出現全新教團模式，於各地紛立道壇，除少數出家道士外，成員多是地方菁英，包括官員、鄉紳和富商。足見全真道面對社會變遷，社會適應力很強。（頁 279-280）以上敘述，大體呈現出在時代劇變下，北京白雲觀更加確立其正統地位，區域中心也逐漸形成，傳教方式也較靈活。然而，白雲觀方丈高仁峒對宮廷政治涉入極深，長袖善舞的形象，與一般宗教家反差甚大，² 故戒師高仁峒顯然極具爭議性。金蓋山方面，受閔一得「龍門方便法門」影響，教團完全走向入世，³ 其道壇活動之蓬勃，⁴ 與傳戒並無密切關聯，主要依靠俗家弟子慈善作爲，發揮社會影響力。惟此法雖符教旨，畢竟不是透過傳戒壯大教團，如衡以當時道內主流意見，不知是視作正統，還是目爲異端？

在結語處，作者以清代全真道歷史，有幾個顯著特點：1. 清初和清末，爲全真道的兩個發展高峰。2. 全真道開壇傳戒制度於清代確立，並延續至

2 王見川，〈清末的太監、白雲觀與義和團運動〉，氏著，《漢人宗教、民間信仰與預言書的探索》（臺北：博揚文化公司，2008），頁 207-234 及付海晏，〈北京白雲觀與晚清社會〉，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2010.1: 72-82。

3 Monica Esposito, "Longmen Taoism in Qing China: Doctrinal Ideal and Local Reality," *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* 29.1 (2001.9): 191-231; 王宗昱，〈吳興全真道史料〉，in Poul Andersen & Florian Reiter, eds., *Scriptures, School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Daoism: a Berlin Symposium* (Wiesbaden: Harrassowitz, 2005), pp. 215-232; 吳亞魁，〈論清末民初的江南全真道「壇」〉，《弘道》2008.2: 12-24。

4 近代金蓋山教團成員，在浙北、上海成立不少分壇。詳王宗耀，《湖州金蓋山古梅花觀志》（內部資料，2003），頁 175-179。

今。3. 全真道地理分布新格局的形成。4. 清代全真道士著述宏富，大型叢書屢有編纂。上述諸點，總結他對清代全真道歷史的觀察，可惜受限於研究角度，本書未必完整呈現清代全真道全貌。以第一點來說，「兩個高峰論」與大規模傳戒舉辦有關。姑不論此說是否恰當，作者理當表列統計數據，諸如何時何人傳戒幾次，並藉由圖表體現，說服力會更強。

本書雖以宏觀視野，俯瞰清代全真道流行，但考證相當細緻。如祖師受戒問題，清初郭守真（1606-1708）固為東北全真道鼻祖，至於是否從王常月受戒，作者態度保留。主要理由是，若王在順治十二年（1655）始至北京為定論，則郭自無從提前受戒。故推斷近代東北道士說郭守真從王常月受戒，以明其系屬龍門正宗嫡傳。（頁 79）至於龍門碧洞宗創始人陳清覺（1606-1705）之受戒，情況如前。按陳來自湖北，師承不詳，得四川按察使趙良璧護持，在二仙庵修行，徒眾遞相繁衍，漸成一派。惟陳羽化百年後，其墓誌銘竟說他在武當山受戒於詹太林。此說學界早已存疑，⁵ 作者推測當出於教門內部傳說。（頁 103）

其次，在太監信仰上，第一章考證明清之際加入全真道的太監，如姚真慧、邊永清、楊紹慎等人，事蹟比較可考（頁 35-37）；第四章對太監入道、成立霍山支派有所討論。（頁 296-301）在宗教著述上，首推劉一明、閔一得：前者著作達二十多種，大部分彙編為《道書十二種》；⁶（頁 234-236）後者編《古書隱樓藏書》，⁷ 收錄道書二十餘種。（頁 253）乾隆時，青城山陳復慧（1734-1802）匯集二百多種道教科儀文獻，編為《廣成儀制》；⁸（頁 174-177）光緒末，成都二仙庵方丈閻永和主持重編《道藏輯要》。⁹（頁 328-334）

本書以陝西省道觀為例，探討道觀、官方與地方菁英互動，三原城隍廟（頁 94-95）、周至樓觀臺（頁 156-161）、城固洞陽宮（頁 226-227）、葭州

5 卿希泰主編，《中國道教史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6 修訂版），第 4 卷，頁 135。

6 劉一明著，羽者等點校，《道書十二種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6）。

7 閔一得著，董沛文主編，汪登偉點校，《古書隱樓藏書》（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10）。

8 陳復慧編，《廣成儀制》，胡道靜等編，《藏外道書·儀範類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2），第 13-15 冊。

9 閻永和編，《重刊道藏輯要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4）。

白雲山道觀（頁 326-328）、沔縣武侯祠（頁 322-325）等例，皆具體說明官府對待寺廟、鄉紳時，立場比較中立。在關鍵時刻，官方如適時調處，得確保寺廟、鄉紳間維持平和。

本書論點雖新穎，惜仍有缺失，各章不足處，已如前述。整體而言，有五點值得討論：

第一，從書名上看，全真各派自然都是研究對象。在本書中，除龍門派勢力最大外，還有金山派（頁 68-71）、全真隨山派（頁 71-72）、龍門碧洞宗（頁 101-104）、呂祖天仙派（頁 153-154）、全真南無派（頁 291-296）、千峰先天派。（頁 295）對入門者而言，了解這些宗派由來很重要，作者應於緒論中藉由簡表，介紹彼等創立時間、創始人和譜系。如以青城派來說（頁 337），創立者李調陽的全真淵源，作者並未說明。若其師承與全真各派無關，自以刪除為宜。

第二，以時間斷限言，本書將清代全真道發展，分成「順治康熙」、「雍正乾隆」、「嘉慶道光」、「咸豐迄宣統」四階段，但作者並未解釋何以如此斷限？不知是否意指朝廷道教政策，四個階段不盡相同？可惜除緒論稍微交代清廷與道教的關係外，他並未關注道教政策變化，如僅佐以幾個皇帝言行，說服力仍嫌不足。其實，對宗教發展構成重大影響的，唯有太平天國、廟產興學之類的重大史事，作者似可考慮以此為清代全真道斷限。又本書既以清代為主，則如杭州玉皇山福星觀李理山（1873-1956）住持的民國事蹟（頁 346-347），似不宜過多敘述。

第三，從空間背景來說，作者在不同時期，對全國具代表性道觀及人物，都深度研究分析。但若細覽篇目，發現在華北，僅北京白雲觀，各章都有討論，而山東僅前兩章涉及。東北、西北（陝）、西南（川）及東南（粵、浙），各章皆有。華中方面，南嶽九仙觀（湘）和南昌（贛）全真道，僅第一章討論。南陽玄妙觀（豫）、武當山（鄂），僅第一、四章討論。故知，本書對華中全真道的討論，份量稍嫌不足。另山西純陽宮（三大祖庭之一）概況，惜本書未有著墨。

第四，研究方式上，作者若以地域為經、時間為緯，全真道區域發展特殊性自可呈現。此外，香會、宣講、出版等宗教活動，亦是宗教興衰主要表徵，其重要性應不下於傳戒。作者若有機會研究道觀地契、帳冊、信徒名冊，

或有另番結論。

第五，以蔣予蒲（1755-1819）的覺源壇而言，本書既以其有意與全真、正一並立（頁 331），但對該壇與全真道的關係，卻欠缺相關討論。此點或許藉由日前最新研究，¹⁰ 有助釐清真相。

附帶提出三個次要問題：

第一，清初北京白雲觀公開傳戒活動，自王常月算起，僅維持兩代，詹太林以後，大型傳戒活動突告沈寂，迄嘉慶中葉始漸恢復，但作者於此並未深究。依《龍門傳戒譜系》手抄本來看，在恢復公開傳戒前，第十至十五代律師傳承仍然清晰（頁 144-145），至少說明此一時期仍有私下傳戒。至於大規模登壇傳戒之欠缺，合理推測是：若非朝廷政策干擾，即是宗教內部因素。因教內文獻不足徵，故作者不妨從外在政策面、制度面探索，或有助於破解謎團。

第二，閔一得〈王崑陽律師傳〉以王常月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羽化，¹¹ 孟至才（1813-1881）、完顏崇實（1820-1876）《白雲仙表》記載相同，但說「葬於白雲觀西偏」。¹² 另陳教友（1824-1881）《長春道教源流》說，王常月恢復江寧（南京）虎踞觀隱仙庵，並羽化於此。¹³ 由此可見，後世雖以北京白雲觀為傳戒祖庭，但當時受戒弟子亦稱南京隱仙庵為「祖庭」，如吳太一〈初真戒說〉¹⁴ 未署「時康熙丙寅蒲月上澣之吉……書於金陵清涼山祖庭隱仙庵」者，可為明證。（頁 45-46）要之，北京白雲觀之成為全真道中心，有長期的歷史因素，其神聖地位難以動搖。但全真道擴展過程中，自然形成的地域觀念，有時卻與「中心」分庭抗禮。類此狀況雖罕見，但或不經意流露出來，頗堪玩味。

10 黎志添，〈《呂祖正書全宗》：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〉，「清代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：呂祖信仰、乩壇與宗教革新」論文（香港：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，2014.12.11），頁 5-44；（日）森由利亞，〈蔣予蒲的覺源壇與全真傳統〉，同會議論文，頁 146-181。

11 閔一得，《金蓋心燈》，《藏外道書》第 31 冊，頁 183-184。

12 孟至才、完顏崇實，《白雲仙表》，《藏外道書》第 31 冊，頁 400-401。

13 陳教友，《長春道教源流》，《藏外道書》第 31 冊，頁 134。

14 電子版《道藏輯要》，張集七，[01p033b]，http://www.daozangjiyao.org/dzjy/texts/JY286_01。

第三，部分全真道道士和徒衆，兼修不同法門。例如，清初南昌全真道士兼嗣淨明派。(頁 104-109) 南無派趙避塵 (1860-1942) 也說，其師了然、了空，雖身在佛門，但修煉口訣卻屬丘祖龍門派。(頁 295) 至若金蓋山各分壇弟子，亦不乏兼習正一，或佛道兼修。(頁 343) 在著名弟子中，王本真 (1867-1938) 頗值關注。《道統源流》(下) 記載，他師承於韋梅影，「儒名震，字一亭，道號完禪，佛名覺器，自號白龍山人。工圖畫，修佛茹素，中外人士，無不嗜其書畫，欽其道德，極一時之聲望，洵足垂老成之典型也。」¹⁵ 王早年致力革命，也是著名實業家。除藝術造詣甚高外，更是頗富盛名的佛教大護法，¹⁶ 惟學術界鮮少留意他在金蓋山教團中的地位。《道統源流》(下) 記載，其弟子至少有李湛然、金慕雲、顧淡塵等十八位。¹⁷

總之，作者雖然自評囿於文獻不足徵的因素，致使本書建構的清代全真道歷史圖像，僅是輪廓式、粗線條的，而不夠系統與全面 (頁 382)，但客觀來說，作者列舉的具體個案，仍有相當的代表性，足以彰顯全真道在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發展概況。而作者獨具的優越條件，包括職務性質、宗教背景及學術訓練，使其在田野調查上左右逢源，有利其提出新穎見解。整體來說，這些豐碩成果呈現清代全真道的複雜面向：一方面大致描繪清代全真道的發展態勢，一方面深刻反映全真道與政治、社會的關係。

15 莊嚴居士，《道統源流》(下) (上海：民鐸報社等處，1929)，頁 30。

16 陳祖恩等，《白龍山人：王一亭傳》(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7)；王中秀，《王一亭年譜長編》(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0)；沈文泉，《海上奇人王一亭》(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1)；康豹 (Paul R. Katz) 著，劉永中譯，〈一個著名上海商人與慈善家的宗教生活——王一亭〉，巫仁恕等編，《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0)，頁 275-296。

17 莊嚴居士，《道統源流》(下)，頁 49。

